

旧版书系

红河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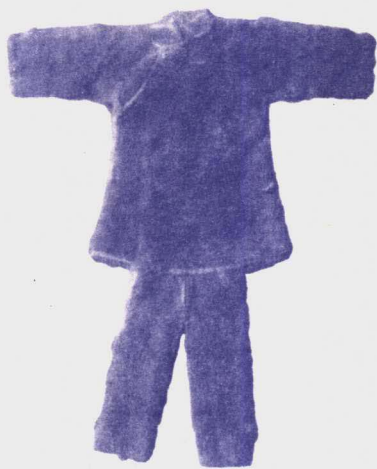


历史无情
它淘汰了数不清的文学作品
历史又有情
它保存了许多经过时间
老人检验的优秀之作
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作品
才能确保它的价值

邵公婉 著

版社

红河之月



历史无情

它淘汰了数不清的文学作品

历史又有情

它保存了许多经过时间

老人检验的优秀之作

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作品
才能确保它的价值

邢公畹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河之月/邢公畹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1

ISBN 7-222-03378-5

I. 红... II. 邢...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0075 号

红河之月

邢公畹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云南专利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4.25 字数: 94 千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22-03378-5/I·948

定价: 8.00 元

出版说明

历史无情，它淘汰了数不清的文学作品；历史又有情，它保存了许多经过时间老人检验的优秀之作。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作品才能确保它的价值。我们推出的“旧版书”一辑四本，皆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名篇佳作。

《南行记》采用了艾芜先生 1935 年代的初版本，仅八篇作品，而已经包含了《南行记》最具代表性的佳作；《滇南散记》是马子华先生写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作品，初版于 1946 年，1983 年曾重版，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作了一些删节，这次作为“旧版书系”之一出版，恢复了初版的内容，这是时代与社会的进步；《红河之月》是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 40 年代赴滇南采风时的作品，仅在 1957 年出版过，出版后即淹没于变迁了的社会环境中，此次收于“旧版书系”中，以飨读者；《中国远征军在缅北》包含了两部分内容，一是孙克刚先生出版于 1946 年的《缅甸荡寇志》，它写的是中国军队在抗战中远赴缅甸英勇作战的动人事迹，二是回忆或记叙这一重大事件的诗文、函电等。

收入这辑丛书的几部作品，皆有“亲历”的特色，从文体上说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即使如《南行记》，文学史皆将其归为“小说”一类，而作者在写作时，“自叙传”的色彩是极为明显的，它与纯虚构的小说自然有所区别，其中

一些篇章当作散文来读也无不可。其它的几部作品纪实性、亲历性更为鲜明。像这样深入蛮荒之地、丛林战场以亲身经历来写作的作品在今天已经不多了，这也是这些作品在半个多世纪后仍然有魅力的原因之一。

我们还注意到，收入这辑丛书的作者当年都不是刻意创作去深入生活，然后写出作品，艾芜因反抗包办婚姻，流浪边地、异国；马子华因工作关系深入滇南；邢公畹则因社会调查，到了边疆民族地区；孙克刚则是因为参战随军入缅。是生活本身激动了作者，他们情不自禁拿起了笔，写下了动人的篇章。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得以保持了生活的原生态，也许我们能从这些作品中感到某种艺术技巧的不足，然而，它们却保持了生活本身的冲击力，使这些作品拥有了后来者不可能再具备的艺术魅力。

同时，这些作品的写实风格让作家记下了边地与异国那些动人的人物与事件。当抗日战争胜利 50 多年后，孙克刚先生对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斗生活的描写，无疑成为最具史料意义的作品；当现代化的脚步以它不可阻挡的力量踏进崇山峻岭之后，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几本真实记载半个多世纪前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作品，更具有了珍贵的史料的价值。

云南人民出版社

书 前

周良沛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文艺界正绽放百花齐放的微笑时，我从云南边防北上，天津的朋友就向我介绍一位解放前写云南写得很绝的前辈，他本人是语言学家。过去，中文系叫“语言文学系”，外文系也叫“外国语言文学系”。“南开大学”任命他为解放后的首任中文系主任，也是对口的。他和老作家孙犁、方纪、阿英等的关系很好，也来作家协会走动。对这位语言学家，作家们谈到他，很亲切。而且，我知道抗战时“西南联大”一位写出《苍洱之间》的教授罗长培（罗辛田），与邢公畹同属国内语言学的顶级人物。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从文学的根本看，又是一目了然的问题，文学毕竟是语言的艺术。可我这个有云南情结的军人，却没能在天津见到这位新中国首次派往国外的教授，他正在莫斯科大学执教，归国时，在文艺界“反右”时有它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的天津，我这有云南情结者，也就无缘见到这位写云南写得很绝的前辈邢公畹同志。至今想来，还不免长叹一声。

新时期，同抗战时一直在昆明“西南联大”，视昆明为他“第二故乡”的诗人、学者冯至老先生，看来与邢先生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往来，谈到他胜利后回到“北大”，有个时期接手主编了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时，以他的“昆明

情结”讲到邢先生在《星期文艺》上所发表反映云南边境生活的散文，几十年过去，仍然是种诗的陶醉。我俩谁也不知道这些作品后来成集出版过。虽然我也有自己的“天津情结”，天津仍有过去的朋友，京津之间，咫尺之遥，早去晚归，去翻翻解放前的报刊，不一定很顺利，也绝非办不到的事。可十年动乱刚刚过去，自己既有面临新时期的欢欣，又有往后回顾自己一时也道不明的情绪。有次我到天津讲课，课后我请司机领我到过去住过的重庆道和平区周围转了两圈，就请他上路奔北京了。

过去，我先后听过不少老人向我介绍一些前辈作家过去写云南的作品之长，有时就是自己，可能不仅是自己，而是一些年轻作者带普遍性之短。痴长几岁，人到中年，回看少时无知的气盛、浮躁，难甘寂寞致以难为文学所需要积淀的深度而致命时，想直接读到前辈这些作品，乃至能与前辈坦诚交流之冲动，还是不断。车在路上，想到自己回了天津，怎不上“南开”拜访邢先生要一份剪报复印带回去呢？可上了路的车，正在飞驰。

前些年，一位在图书馆工作的年轻人，惊喜地向我说了他的一大发现：他从一本地方性的内部资料，完整地读到一本很久都没让他这么喜欢的书，那就是邢老先生的《红河之月》。这年轻人更没想到，对于我，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从这本资料看，这组《红河之月》也是转载自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八月第一次印刷的版本。那时我还在天津，可没看到这本书。根据我对出版的了解，这个“八月”，也许是发稿，或许是出校样的日期，因为书序都是十月十二

写的。等书面市上架，该是年底，乃至跨年了。因为这个“八月”正是邢先生从莫斯科归国的日期。他在苏联的工作，口碑甚佳，他在苏联接受教授最高待遇，几年的积蓄，照北京作家那时买的四合院，可以买好几所四合院，地点还在东单、西四、王府井一带，可他都交中国驻苏大使馆，全部捐回祖国了。他回国时，天津将他解放前在当地所发表的这组《红河之月》出版成集来迎归一位学者作家，自然是束最美的鲜花。

可是，它出版得很不是时候，那正是“反右补课”之日，机关团体都在按下达的指标比例追加“右派”，随后又是“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读者和评论家也很难注意这么一本还是写解放前的作品。何况，文化“跃进”也在追赶一个“村村是诗村”、“人人是诗人”的境界。那时，从人民群众中，确实涌现出不少好的“新民歌”。今天对它，全盘否定不是科学的态度。可是，在一个大家（自然包括文艺界、评论家在内）的眼睛，都盯着工农群众中的某某出口成诗的时候，《红河之月》这样的文学作品，自然容易被忽视，乃至淹没在出口成诗的“诗”之中。它被当作“资料”印出，是在书市绝迹。再版公开发行，正是时候。

我是在视力很坏的情况下，贪婪地读着它，读几页眼前又模糊一片，是什么也分不清时又被迫放下，每篇都是如此几反几复地把它读完的。付出的代价不小，我看，也值。别的人怎么看它，是另一回事，但对我这么一个有云南情结，几十年始终注意滇味文学的外省人来看，它是别具一格的。

开卷头篇的《灯》，是第一人称的“我”，一个科学工作者为田野作业，去到现在的平江县磨沙乡。有个老李同行，

有两匹马两个赶马人与县上护送的一个排长和一名士兵。整天都在走不完的松林穿行，沉闷而阴冷。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每步都在“试探着生和死的界限”，一失足，就要滚下万丈悬崖。如书中所说：

……我们需要光亮，可是深夜的山中，一无星子月亮，二无远近村落，再加上风和雨，我们只感到黑暗底波涛从我们的衣服上，头发上，手缝里，汹汹地冲过罢了。马打着虎坐，长嘶着。我们全停了步，因为人是只能活一次的。可是，想不到有一个马哥头竟是盖世无双的智者——他想起了他的鸦片烟灯。一枝火柴划亮。灯燃了。亲爱的读者！这一夜，我才懂得了“光”这个字是怎么个讲法。西洋人说上帝创造世界，首先就要这光。上帝创造世界自然是谎话，首先要光却是句聪明话。而灯燃了，一切形象，一切色彩都在它的面前裸露。我们彼此看见了面孔如同久别的亲人，也看见了路上的沙子与石块，看见了灰白的崖石和绿的草，看见了横斜的树枝和叶尖上悬挂着的雨珠子，看见了风中光亮的雨丝。我们甚至感觉到一千重山，一万重山都接到这灯的光。我们不惜把全世界的赞美词都用到这盏油腻乌黑的鸦片灯上。……

在黑暗中看到光亮的这种心情，是诗的浪漫，这光源来自一盏“油腻乌黑”的烟灯，又毕竟是令人尴尬的现实。人们已麻木于它，自然是个社会的悲剧。他们在这光亮中“痛快地跨着步”，不久，又见“远处有一团小红火在上下移动”，原来是另一匹马也点着烟灯在夜行。是位在省城读大

学的普诚带了个长工也上磨沙，于是结伴而行。这一带普诚熟悉，也相约在前面不远的李保长家过夜。雨过天晴，抬头惊喜地见前面树梢有盏红灯。普诚知道，那是李何公挂的。他儿子被抓丁抓走了，下落不明。他几乎要疯了，地也不种，在保长家打杂。每夜点亮它，怕儿子回家夜行“踏到河里面去了”。等大家在保长家歇定，酒也“喝发了”，那个排长见李何公还在念叨他儿子，反似来抓丁者所说：“好汉空手走天涯，死了也拉倒。只见你们这班保镖，非得拿机关枪来提不可”，激起周围的人都“握住腰间的短刀把”，被保长制止住了。深夜，只见四五个人拥着那排长进来，“他满身是血，哆嗦着”。李何公以挖他积攒下的银子为由，约他出去。排长说：“我和他上山，他抽出刀来宰我，我跟他揪打，他从悬崖上滑下去了！”从此，寨前那盏“红得像一颗赤子的心”，“灯影落在溪水里，蜿蜒成一片红霞”的灯，本来它“在告诉人的方向，警戒人的失足”，可它熄灭了，人们失去心中的希望了。

“灯”的前后一串对应、联缀的意象，太戏剧性了，作者却没有让它戏剧化。这哪是盏灯啊，它是人生哲理的阐发，是诗的忧郁沉思。这“灯”在故事中出现时的细部描写，全是写实的。全篇对应来看，又绝对是种隐喻，是全篇的象征色彩。比之有些只会以兄弟民族之奇风异俗而猎奇的作者来讲，这种情理交融，达到思想与意境合一的深幽，是真的文学品格，比之猎奇的噱头，它有容人读进去的广阔空间。

一般的说，包括象征（是主义，不是“色彩”）等在内的唯美作品，多是以高技巧的形式出现的。然而，在这里却

不是这样。全书起于《灯》终于《燎》的七篇，中间记述的过程，同作者自述他那五个月田野作业的那段经历完全吻合。作者既把它列入“小说”之列，因此，其中当然允许，也可能有它的艺术虚构。放下《灯》细想，“灯”在几处的出现、应合，不能不说是巧思，但作者又完全以他田野作业的沿途见闻写来，未见雕琢，真是神来之笔。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沈从文先生在他主编的《益世报·文学周刊》上著文道：“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常载邢楚均先生有关西南地方性故事，用屠格涅夫写《猎人笔记》方法，操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天时地理背景之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老一辈写云南民族地区生活的作家，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艾芜的《南行记》，到它十几年后的《红河之月》，作品都是很地道的滇味，而作者都明说自己是受过《猎人笔记》之影响的。这倒是颇耐人寻思的问题。也许，作为外来者，记述一路见闻，这样写来，更有笔墨的自由，作者的自由，接近随笔式的散记。在邢先生之后，马子华的《滇南散记》，虽然作者没有说，甚至可能谈不上《猎人笔记》对他有过什么影响，但作品整体的格式，仍然是接近前者的。这大概是从作者对内容表述的情怀极其自然而生的形式。不过，读了，乃至喜欢《猎人笔记》者，可能就是一拍即合的契合，并唤起作者对此种艺术追求的自觉。不过，艾芜是截取他生活一个一个片断并加以集中表现，更趋于小说化。而《红河之月》，邢先生虽然定位于它为小说，却又像沈先生所说，“还带点‘原料’意味”。这“原料”，首先自然是指其反映的生活之“原”汁“原”味，同样也指它反映的形式朴素、自然。但

从《灯》看，它的“原料”味是毫不“原料”化的。那烟灯，是一个赶马人，普通劳动者的，由此可见旧社会以“云土”著名之地的“烟土”对人毒害之深，而另一盏红灯，则是象征良知的召唤，即使“原料”就是如此，一旦成为如此的艺术对应，它就不再是“原料”了。那个担任护卫排长的一句“死了也拉倒”所以击痛了李何公，是作者在这之前，写到当局从四川贵州调兵把守敌人要攻打的车里、佛海时，“遇瘴气”。“一路上真叫难看哪；有光着身子浮肿着的；有烂了一半流着黑水的，还有曲着脊椎骨用两只白森森的手骨抱着自己的骨颅头的，附近村落中的狗，都来吃这些肉——烂的也吃，不烂的也吃，哼着，咬着，打着架。吃啊吃的，到后来，眼睛也变红了，毛也脱了，露出一身红稀稀的肉来。到后来，既吃死人，也想吃活人了。个把两个人从那里经过，那些狗就扑过来，啊喔啊喔……真恼火。”这是多么恶劣的自然环境，国民党反动派对待这些士兵更恶劣啊。这条往下可能要走过的路，人还没去，就遇到如狗一样要吃活人的这个排长了。虽然他带了一个兵来护卫，可是路上不想动手，只等吃现成的那副德行，就从侧面的一个细节写出他旧军官的本相。等他看到李何公为儿子被抓去而伤痛欲绝，他的狗性毕露，也无法不让他咬人。偶发的故事，社会根本矛盾的爆发，是作者思想的深刻。李何公由一个絮絮叨叨，尽在向人诉苦的可怜老人，也以他宁可杀不可辱的刚烈屹立在我们面前。作者不只是写他个人，而是写一个民族的群体。这个排长头次出言不逊时，“四五只手同时握住腰间的短刀把。李保长四周看了一眼，这些手又放下来了”。待悲剧发生后，“第一个拔出短刀，我看见寒光一闪。排长（三

角脸)说:‘我并没有推他。’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拔出短刀。三角脸说‘你们得让我走,我立刻就回去,我们是县政府里的人。我是官身。你们总有个王法。’说着,他就回身夺门。第五个朝门前一堵,从腰间拔出短刀。保长从桌面上拿起两手,搓着,两眼还是看定三角脸,仿佛要用眼把他吃进去。大约有五分钟全房没有声音。保长忽然朝桌子上猛击一拳道:‘让这两个东西滚!立刻滚!’第一个人朝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人看着。第四个人朝第五个看着。五个人互相看着,收进刀子,慢吞吞下楼。”

这组无声的镜头,充满动感的语言,内蕴着爆裂的仇恨。作家像电影导演运用“蒙太奇”似地剪辑组合为很有视觉冲击力的镜头,很有电影中惊险情节的艺术效果。保长除了与那五个拔刀者有民族同胞之情,还为自己是保长,压着一腔义愤放走了这条狗,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积怨只能埋得更深,这也是故事又一则的开头吧。

依照我们现在分段理清的故事头绪看,它可能适合“现代”的那种多主题网络式的结构,可刑先生避开将它们完全纳入故事情节的直接表述,而是照着旅程的顺序,舒展悠然地展开。若作为“小说”来看,有的地方和它的中心并未贴紧,但那些有关的民族、民俗、社情、历史、自然风光等等,可能是不在意的几笔,但溶入全篇,汇成作品人物、时代与历史背景又浑然一体的典型化,作品就有它更耐读的厚重了。后来人写的“边地小说”若模仿它为一种模式,自然很糟,但忽视作更高的追求,也是遗憾。解放前文学圈外的学者写它能写成这样,是难能可贵的。

全书终于《燎》之“燎”火,又是作者迷路时看到的光

亮。那是一群开荒者的篝火。兵荒马乱，年轻人把饭盒“装得满满的，揣进怀里，远远跑进深山大箐。如果风声紧，甚至黑夜都不回家了”的日子。人们围火诵读“五百年，大运转，红羊黑马对面喘；只怕硬，不服软，你们官家算个卵”的歌谣，它所表现人民盼着社会变革的心情，正是预示新世界诞生的人心基础已具备。虽然“燎”也是象征，可能有人看它还嫌朦朦，但作品思想矛头之所向，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同时，在那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山里，一个混有犹太人血统的德国牧师，也不能不逃出希特勒统治的恐怖，来中国加入了基督教中国内地会而在此处传教。山外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倒从这个牧师的离乱，带来一点山外的信息，而那巴伐利亚人在哀牢山的月光下唱的思乡曲，山里人又听出什么呢。山里各种莫名的枪声会莫名地响起和消失，防身的和横行霸道的刀，都会同样溅血。教会学校的学生白大贵画画的红色用的是街头溅的血，校长告诫他这是“不能的”，牧师“希望魔鬼不和你在一起”，同学们见他喊着“鬼来了”，白大贵也吓得惊慌失措。不知何种巧合，他父亲在田头累倒了。他只会啼哭，老奶奶不仅不要牧师医治，反求牧师打一针“叫他赶快去吧”，离开“这种日子，这种世界”，那样，她认为儿子倒“有福了”。这是看得心惊肉跳的场景。作者对这两件事未作任何联系，可通过白大贵的情绪之显现，恰恰又无法将两者断然分开。老奶奶诅咒的“这种日子，这种世界”之世事无常而牵连到人之命运的莫测，有时就会显现为莫名的神秘。书中专题写到“祭衣”的活动，是“边地小说”有些热衷猎奇者至今也未涉及到的民族风情。

同时，语言学家毕竟是语言学家，他不像影视作品的特型演员那种一味地方言化，而是将某些昆明方言的用词极其自然地溶入在他叙述的规范中，这对“滇味”作品，不能不是有益的尝试。

对三十年代的《南行记》，我曾说过：“艾芜这部作品，以上世纪二十年代滇缅边境那下层民众的苦难与斗争，以及风情风光的幽秘多彩之展现，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反映社会新领域所带给读者的惊喜和瞩目，也是对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十几年过去，邢老又将这一新领域拓展得更广阔，伸入到更新的地带，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不论个人的兴趣如何，它对那特定地区在特定时空最形象的历史，已是没有任何可替代的见证。

邢老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十日生，安徽安庆人。一九三二年考入安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学校就写作、发表过小说。一九三七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文所在南北考场各取一名的研究生中，他在南京通过了赵元任和丁树生先生主持的复试。语言研究成了他终生的选择。抗战时的红河之旅，成就他的这本《红河之月》，不少读者是陌生于作者名字的。一本《京派小说选》从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二卷六期选出的《棺材匠》，编选它的京派作家是几经周折才晓得他们这位文学上的同仁还在“南开”。有些无文的人文比有作品可留下的作家之名声大大的事，什么时候都少不了，而历史总是以作品认作家的，这也是什么权力、任何“炒”作都无法改变的公正。邢老今年八十有六，在“南开”有时还上大课，一上课堂，一讲两三个小时，也是常事，令人十分钦佩，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他当年的红河之行

的感受，远远不是这七篇可包揽的，一定还有许多想说的，没写完的。真愿他老在专一于语言学时，什么时候兴致来了，玩上一票，又给我们写上几篇。

二〇〇一年“七七”翠湖。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大历元年，杜甫在夔州作。